

## 论当代中国的学术症候

○ 何 蹊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对当代中国的学术,以纵向的历史眼光看,它处于整理整合的历史时期,而横向来看,它处于功利导向的社会环境中。当代学术有四大问题,包括停留在文献整理,而不能将学理推进创新;研究中各自为阵;硬性化的评价标准形成学术的强权;功利导向下学术的浮躁而不能深入。具体到学术方法上,有五种捷径。这包括整理新出文献;各种的比较研究;对已有理论进行组构重建;依附性的文献阐释;依赖于文献引用的变相抄袭。但这些捷径包含很大的隐性缺陷,抑制了学人的创新性。

〔关键词〕中国当代;学术症候;整合;功利导向

### 一、学术发展到当代的历史性特点:整理与散漫

将学术的发展作一个历史的观照,则可在比较的视阈中看到,学术发展到当代有两个特点,即整理与整合。这种偏向宏观视角的研究,虽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阶段性整理和总结的需要,但也带来附加的负面影响,即具体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够。这是中国当代学术的一个大的症候所在。

当代中国的学术,普遍存在着一种学术的发展路向,或者说由学术方法所表征的普遍的当代性症候,即我们的人文学科的学术,特别是文学、历史、哲学,重在梳理、组构,而非创新发展,将学术推前。纵向梳理历史,横向梳理各国的学术,对各学科的学术关联进行普遍的“比较研究”,对各个学术议题进行综合、整合、组构,再单个地呈现具体学术论题的本原状态,而非真正的研究推进和理论

---

作者简介:何蹊(1986—),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南开大学博士,中国伦理学会会员,元代文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元代文学。

创生,这是当代中国学人所喜欢采用的方法和中国学界所面临的普遍学术习气。

这如同清朝的整个学术动态更多地在于整理历史文献,如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编纂《四库全书》《佩文韵府》等等。清人的经学在综合前人经学成就的基础上,无以推进,而转向音韵、文字、训诂等技术性的朴学路向。这与明人在心学影响下空前的学术胆量是大相径庭的。明代学者更注重思想的萌发创造而不是国故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读,明人甚至在不那么博识的学术积累上表现出高涨,甚至是张狂的学术创生性,而不是固守其旧。这虽为后人所不屑甚至诟病,却产生了诸多思想和学术的进步火花而推进了明朝的文化繁荣。明代是一个思想盛出的朝代,产生了大批思想家和哲人,如李贽、王阳明等,其对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经历清朝谨慎的学术回流之后,由宋代开始,或者具体说由理学四大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理学开始的重义理、重思想、重创造的学术路向开始转向,而向着重视文献、实学的路向进发。这是一种对因思想过剩而产生的空谈义理而无实据的矫正,也未尝不可说是思想的枯竭和创造力倒退的表现。

当今的学术路向不是回到隋唐情气所主的学术风格,更不是回拨到魏晋六朝时的追逐玄理、名教,走向超现实的空泛审美,或者秦汉的经学一统的局面,而是经由西方文化与学术的洗礼(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洗脑?),而变得不知所措、散漫、无状态、无主心骨。这反倒有点像回归到先秦诸子的时代,学人们各执一家言,在学术上各自为学,却少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自主与创生性。

## 二、当代学术环境:功利化导向

不同于先秦诸子的是,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出发点和其所一以贯之的精神已经不是先秦时代积极用世的事功心态,不是为大众之利益,而是在经济驱动和利益导向下,一切以为私的功利目标为内在的精神驱动,已经由积极主动变为求取在个人功利导向的现代化社会中生存的被动手段。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奥秘在于它的私利诱导和鞭策,它主张作为个体的个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并承诺但凡有奋斗就有收获,因为市场是平等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蛋糕(也就是个人私利)的大小取决于每个人对这块蛋糕的向往以及付诸的劳动。这就把人类社会打回到原始的生物竞争的基本准则中去了,但蛋糕是否真的最终全属于劳动者私人所有,这却未必。一场货币改革、物价调整,就会颇为简单且无形地将所有私人劳动而得的蛋糕攫入到市场规则制定者的腰包。现代知识分子的功利为学与先秦诸子对天下的悲悯心态,以及抛却了为私性和个人功利性的用世心态,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目的性是很不一样的。

而在学术上,思想和学术本身的纯粹程度,也跟其基本的学术态度和出发点是相关联的。大公无私的用世和为学术而学术的出发点,与为私的被动的功利出发点,产生的学术激情和生成的学术成果的纯粹度是不同的。学术本身是纯粹的非功利的探求,要求其作为人类高级的精神文明的纯粹性,而功利为私的学术出发点终会使其着上功利色彩,影响其思想的路向,而变得驳杂和虚伪。因

为,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学术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用以兜售的学术商品,是以一定的市场价格来换取其交易所得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学人用以谋生的手段。另外,它的实际学术价值远较前者为小,这是因为,学术在一种兴趣和道义激情激发下(比如儒家的用世情怀)的生成,是比在迫于生计的个人的为私的功利追逐下的生成,要来得自然、快捷、稳实和纯粹。就以当下的学界而论,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学术项目的申请,成了几乎所有学人们用以晋升职称,提高社会地位,谋取生存的途径。学制中用以培养学术人才的学位制度,如硕士、博士、博士后的设置,也成了许多在社会中不能谋求称心工作的人们的一个暂时避所,和再进入社会参加激烈市场竞争的一个跳板,真正的学术热情则被排挤到很可怜的一隅。当代的中国学人,真正为学术而学术的又有几个呢?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带着功利寻求的成分。这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功利性的学术动机下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现象,如人所熟知的学术造假、抄袭、无谓的学术攻击、某些以金钱运作的学术机制。

当然,不否认学术生产是应该获得社会的回报,亦如我们不可否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sup>〔1〕</sup>的大势所趋,但若学人太过先入为主地以此回报为学术的动机,那么整个中国当代的学术是否也会被现代化潮流,被市场经济这个怪物异化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智力与钱的交易,甚至也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商业投机,即学术投机。这就是为何当代中国的学人们常常一窝蜂似的对某个热点问题,甚至被媒体炒作起来的无关紧要的“热点”进行扎堆研究。因为他们需要寻找学术中的商机,以最少量和最简捷的研究投入来获取最大、最快捷的学术回报,也即学术收入。对这种商业化的现代学术生态,是否需要我们在利益追逐的歇脚口,去深入反思一下呢?就如提倡拼命劳动挣钱的人,在喘气的时候,反思一下:为什么要挣这钱?挣这么多钱干什么?我到底要什么?我的价值在何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看似无厘头的哲学追问,虽然因其终极的无解而显得有些犯傻,但它却是终极存在的,能让我们在被异化为不断转动的市场机器零件时,可以冷静一下,而做回人作为人的那个内在的、本原的存在。

### 三、当代学术的四大问题

我们可以总结当代中国知识界,主要是人文学科学术界的一些问题。

其一,是停留在文献的梳理、整理、总结,而不能将学理推进创新。这包括对本国历史中的文献和外国文献的对待上。与之相应的有一种代表正统的学术风气,即强调扎实的文献功底,翔实材料论证,而反对空谈义理。这用历史的眼光看是清代朴学的延伸,但即使是朴学风气的良性继承,它本身也是理论创新不足的代称。一个很奇怪,但却有其存在合理性的现象,即人们常谈论的: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科中无真正的大师。当然,这是以历史上的顶尖级人物为参照标准的。比如,现代文学中无人能超越鲁迅,古代文学中无人能超越李白、杜甫,史学家无人能超越司马迁,哲学家无人能超越孔孟老庄。若夸张地说,中国当代的人

文学科是无文学、无史学、无学术的状态。虽然在学位体制下,我们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博士,我们以经院式的教育方式培养了遍及各地的学者、专家,各省都有自己的社科院、文学联合会等等,但是真正的大师却越来越少,甚或说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懂让自己真正能动地开始创造和思考。中国当今学术的创造性是很虚弱的,大家都在依赖于故旧、他者,而在依赖中失去了真正的思想,以及作为人文学科工作者的学术灵魂。这其实也为一些有志识的中国人所洞见,所以我们总能听到学界的一种呼声:强调创新性,强调有思想,有个人的独到创见,哪怕不对,只要能自圆其说,也是值得嘉奖。但人文学科及其学术到了这样一种不计结论和效力而深呼创新的时代,则可见当代学人、知识者们的独立性、思想性确实需要提高了。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我们的人文学科和学术到底在干什么,到底是要行进到哪里去,达到一种什么状态。

其二,是各自为阵的散漫的学术状态。虽然我们有很多学术团体,包括学会,以及因于师承关系的学术群体,但我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统,一种真正的论争的、对话的学术汇集。大多数的学人依然停留在“找寻”有价值的学术论题上,并各自为学。他们把心思全放在搜寻一些论题上。许多人抱怨其领域内某论题已经被讨论殆尽,没有开掘的余地。但其深在的原因跟思想的匮乏和学力的不足,以及各自为学带来的学术视野的狭窄有关。当今的学术界不是没有论题,不是好像什么都被研究完了,而是还有很多亟待深入研究的论题,我们已有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甚或是未开始,而那些似乎都已经被触及并被研究过了的论域,实际还有很大的深掘需要。就像一块荒地,大家都去抢占领地,采撷其上的已有果实,摆出到市面上,变为自己的成果,最后似乎都已被翻过,已开垦殆尽,但却还有很多遗留资源,况且,贫瘠的土地上,人们还应该留下来用心开垦、种植。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有新出土的文献、新的思想视角、新的提法,人们往往蜂拥而去整理、梳理,最后却不深入研究,导致了学术的被滥垦滥伐和资源破坏。真正有思想的研究者绝对不会说某个研究论题已被研究透了,没有研究的余地了,而抱怨论题之少。因为,一个基本道理告诉我们,学无止境,学术也无止境,尤其在人文学科的领域,没有谁能说他的研究就等同于真理了,那么,学术之径就永在,学术论题也在在皆是。

其三,是学界的硬性化评价标准容易形成一些学术的强权问题。如以学历、学位、职称、学术团体中的职位、发表论文著述情况的这样一些硬性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并定位其学术地位。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如发表文章过程中的等级之分,对学位、职称、单位等方面的歧视或迷信。由核心刊物、权威核刊、名校名导、高学历学位等主导的学界生态,有其隐性问题。这导致学术的官制化、等级性及相应的不平等、不合理现象,并催生学人的学术等级观念、自我身份区别意识及相应的地位爬升念头,学术群体中的江湖习气与世俗风气。第四个问题也是前三个问题的直接产生原因,而更深的在于学术功利导向的整体社会背景。

其四,是学术风气的功利化导向,甚至市场导向使得学术变得浮躁而不能深

人。我们也可以看到报刊书籍出版界的商业化运作,这使得一个学人要想在学界有话语权,就必须首先进行商业化的学术投资。中介发文、请人代笔等现象于是产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早就有的提倡,即讲求学术积累、沉潜,要求学人要坐得住冷板凳。可以说,当代强调文献功底、基础知识的学术风气虽少了创新性,却正是对学术之功利浮躁的反拨、纠偏与矫正,或可说矫枉过正。

这四个方面影响着中国时下的学界风貌和气象,而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关联,互为钳制的。

#### 四、学术方法上的五种捷径及其隐性问题

基于现代社会中学术功利化的导向,人文学科领域的学人们在治学方略和学术的方法论问题上,常常寻找一些捷径。这主要有五种:整理新出文献;各种的比较研究;对已有理论进行组构重建;依附性的文献阐释;依赖于文献和思想引用的变相抄袭。这些方法是容易出成果而且比较简单,容易效行的。但这些研究捷径其实有其隐性的问题,过分依赖这些研究方法,则往往会遏制学人的思想创新性。

其一,整理新发现文献成为一种快速获得学术成果的捷径。在论文的择稿过程中,有关新发现文献的整理往往更能被采用。这从另外一方面恰恰反映了一个事实,正因为有真正学术和思想创新的文章太少,人们才将文献整理这样的学术基础工作奉为头条,甚至把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也当作是创新。但材料的新发现并不是思想理论的发明创新,只是对本有和固有事物的发现而已,是弥补论证而非增添创新。

其二,比较研究成为显学。比较研究的实质是组合研究。组合物相对于单个的原事物乃是一种新事物,因而组合本身具有创生性,如化学里基本粒子的不同组合会构成不同的物质一样。而按数学原理,组合的方式和结果是非常多,甚至是无穷的。组合发生在两个事物间,也可由三、四、五,甚至多个事物进行组合。以组合为实质的比较研究的创生空间因而也可以说是无穷大的。但组合不是无中生有,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但学人们往往将经济、政治、人类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进行比较研究,将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概念引入本学科本论题,所以有生态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名目繁多。因为几乎所有的论题都可以进行比较,数学、物理学的方法都可以引入人文学科中来,而不同时代的相关论题也可以进行比较。比较研究发生在不同学科、历史、人物、作品、论题之间,以及同一论题的不同层级之间。聪明的学人,对待任何论题,哪怕极不相干,相去甚远的论题都可以找出其联系。因为比较研究就是组合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关于相同、相异的研究,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不是相同,就是相异,这是这个二元世界的基本规则,何况在本来就有很大讨论空间的学术论题之间。比较研究永远不缺研究的内容,即同、异比较,所以比较研究是一个无底洞,是产出学术成果的捷径之一。当然,比较研究本身是有很大的学术潜力与价值,值得我们去关

注。但它既然是一种严肃的、纯粹的学术方法,我们在研究动机上就应该保持其严肃的学术性,而不应该功利地利用之。粗浅随意和硬性联系的论题组合与比较研究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学术捷径,虽然也能产出成果,然其价值则不堪考量。

其三,是重组已有理论。这与比较研究的组合实质相同,但它直接省略了比较的分析、论证过程,而只是将现成理论及其结论观点进行改装而已。在上面这两种学术捷径之外,学人们在最终面对理论创新的难题和任务时,往往采取一些较为直接的应对方法。这有些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般的学术应对。那就是:如果确实没有个人的独到创见,则就已有理论加以分析、组构、中和、变换名目、异化,而作为自己的观点、立场和理论创新,但它实际并非创新。这种研究方法往往被用于对待外来思想学术上。中国的学人多采取一种中和的条件研究策略,即分析和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他们往往有这样的研究进路:A理论在C条件下有其正确性,B理论在D条件下亦有合理性,因而A、B皆正确。但这其实亦非创新,而是中国人在中庸的思想传统(或可说一种兼容手段)下的一种学术取巧。而这种对理论的重组,因进入现当代后学术上的整理整合风气而成为一种习气,甚至普遍盛行。但,学术的整体的大整理整合只是一种对历史故旧的回顾、梳理,而非真正的创生性的创新。

其四,是阐释的学术路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采用阐释陌生的他者来进行学术的生产,这其实是一种依附性的学术,而非真正的学术创新。一种惯用的学术文章写作方法是,罗列各种文献,然后进行文献阐释“分析”。如果在阐释之后,不进行理论的申发、总结,这表面是分析,实际等同于对该文献进行的学术话语传译。这样的分析,在这里也就没有多大的创新意义。因为这个学术过程限于阐释这个最低的层面,而并未进行完整而成为一个有学术创见的个人的学术创新,这个粗制的半成品的学术品其实并不能算得上真正的学术。

然而这种学术方法却在现代的学术语境中能够存在下去并获得认可,阐释几乎成了学术中的一种惯用路径,这一方面是当今学术不严谨的大气候所致,另一方面则跟阐释本身的学术假象有关。因为在学术上,阐释实际上就是对陌生的文献进行学术话语的解说,而这个解说,或者说学术传译是能动的,是注入了学人的主观因素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学界,只要可被作为文献、论证材料,那么学人就可以对其进行阐释。我们依附并阐释古代的文獻、外国的文獻、其他研究者的文獻。

这里,文献的意义可以被扩大为一种陌生的他者的思想、学说及研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术中的阐释并不限于实体的文献材料,我们往往也在引入并阐释别人的学说、思想。这也是构成学术评价、论证的基础,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是积极的。因为,首先,被阐释的对象是相对于阐释者(也即学者本人)和阐释文章的受众(即广大的读者)有着陌生性的,阐释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其次,阐释不等同于绝对的学术翻译,即使语言的翻译,也会因有所误差而不可能完全等同。何况,在学术的阐释中,阐释者可以加注很多的个人学术视角、学术思想、学

术观念,阐释等同于二次创造。这种二次创新性,如同文学中所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也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使得阐释作为一种学术的基本公器而具有了学术创新的色彩,而能在学术界中挤入了学术创新和前沿的位列。

但是,这种阐释有自身的缺陷,因而需要对其加以批判。因为:第一,它是一种依附性极强的学术方式,因而也是一种始终屈从被阐释之陌生对象的跪膝的学术路径,而没有真正的主体性树立。它都在阐释别家的东西、固有和已有的东西,已限于学术的引入了。阐释的学术研究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知识介绍、知识译介,其作用主要是在于话语中介的意义上。所以当代的学界引入了很多,阐释了很多,包括国外的知名学人的思想、历史上学人的思想,但其实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走向了守旧和模拟。而模拟是落于第二义的,守旧也是一种相对创新的倒退。第二,阐释导向思想研究的滥觞。阐释是对作为语言文字的某个文献的阐释,它要发觉的是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本原思维意识,因而阐释所指往往是作者的思想。但思想本身具有非实体性、虚性、转瞬即逝的流动性、变化性,而不可具现具指。而别人的思想更是作为捉摸不定的陌生他物而难以原原本本地被复现还原。因而阐释所指的这个他者的思想虽具有客观存在性,却也具有不可复原性,这就给阐释本身提供了意义价值和行为根据,又给其提供无限的指向性和可能性空间,而为学人们无谓的泛滥化研究提供了可能。学界现在有一种风潮,即对任何东西都进行思想研究,就是受此影响。文学学术界在研究别人思想,哲学、历史学界都在研究别人思想。思想研究,可谓是极为正当、且高大上的研究。如人可以理直气壮反问的是:学术界若连思想研究都有问题了,那什么才是学术研究?但,思想研究仍是值得批判的。因为一味去研究、咀嚼别人不可复现的思想,不遗余力,是无谓的徒劳。而且大家都去研究他者的思想,那么只会是造成学人自己思想的被排挤。思想研究、思想阐释,若没有学人自己独特真知洞见的穿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没有创新,失却自我,失去学人自己思想性的他者阐释,甚至可说是复述,也已落入第二义了。第三,被阐释的陌生他者必然具有自身具体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意涵,这使得多样扩散的阐释和阐释论证在力求吻合阐释对象本在意涵的层次上而变得没有实质推进的意义,也使得惟一的最高的完全吻合性的阐释也只能成为不同语体间的一种机械的学术翻译而已。第四,阐释主体对陌生文献和学术进行的阐释若加注主体能动的学术思想,那么这已经不是真正的阐释,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利用了,或说学术的技巧了,是借助阐释进行自己的思想学术创造。这虽十分富有创新意义,但如果把这种创造性的文献利用滥化,而将阐释的意涵指向无限的开放空间,那实质上就形成了学术的不严肃和对文献本身的偷取利用。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关于一些文献,甚至字句,如“道”“风骨”等概念各执一词的阐释,表面上是阐释,实际是依托于古典的陌生,而进行的具有现代学人思维,在现代学术语境和视境中的论争而已。大家都认为自己的阐释更接近其本义,更符合阐释的求真原则,而事实上是大家都已经舍

弃了本真,也不是进行阐释,而是相互的学术思想的攻伐论战而已,那么,这种学术官司是否必要呢?这种学术风气又是否值得提倡?如果加入了阐释者主观性的理解,这是大有意义的,但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此冠以“阐释”之名,而定要依托于被阐释对象的固有和本真权威,用以为自己的思想讨一个地位和被认可的可能。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发挥和再创造,是研究者自己思想的呈露。这是摆脱学术功利,有自我思想树立的途径,也是一种诚实为学的态度,哪怕学人的自我树立会因为自我的非权威性而不被认可。

其五,功利强制导向及思想创新性的不足,使得抄袭成为一种学术捷径,这包括直接抄袭和变相抄袭,变相抄袭包括思想抄袭和文献抄袭。上面所述四种学术捷径其实也反映了学人思想的匮乏。虽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sup>[2]</sup>,学术的方法论也是学术的重点,但是若一味依赖方法而非独立的创见,那么学术终会倒退,因为这是在吃老本,而不是去开垦创植。这种问题被扩大化,则演变成当今学界的一个现象,即抄袭之风的屡禁不止,这正是学术思想贫乏,不能创新的反映。在外界看来似乎是作风问题,在抄者来说其实是无奈,因为这是整个的学术大气候、大背景所促使。丧失了创新的能动性,只能走向发掘材料、组装、比较、阐释,而这些惰性的研究捷径益发消泯了学人的创新能力。本来处于思想贫乏时期,又要应对各种硬性的成果指标,而且不择良莠地不断生产高学位、高职称“学术”人才,造成不适合学术的人因为功利之图和生存所需而被安置于学术的位置,在被迫创新的过程中无奈只有选择抄袭,否则就是被淘汰。因为完不成毕业论文而跳楼的事件竟有发生,或许也是这种社会问题的侧面反映。而抄袭也不仅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字句、观点抄袭上。其实,中国当今人文学科学术界,特别是笔者所知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界中,存在大量的文献引用、罗列、堆砌,使得文献数量超过分析论证和总结,甚至没有分析论证和总结,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抄袭。这种说法或许有点过头了,但却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学生们用来凑够论文字数的一个最好的又最让评阅者无法挑剔的方法。这与学界重视文献整理的风气是相呼应的。文献的简单整理,甚至仅止于标点断句,都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成果而扬诸于世。但这在古代完全是学人应有的基本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而绝不是一种创新性成果,也不会是一种“学术”成果。然则文献的简单整理何尝不可说是一种对现成资料的袭用。而造成这种学者和评者两难的境地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学术风气,一种不完善的学术体制,一种学术的商业化和功利导向。

####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百二十九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6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页。

〔责任编辑:刘毅〕